

张骥 刘中民 等

文化与 当代国际政治

Wenhua Yu Dangdai
Guoji Zhengzhi

人民出版社

本专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2年立项
课题最终成果。课题批准号02BGJ008。

本专著得到河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

Wenhua Yu Dangdai
Guoji Zhengzhi

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

张骥 刘中民 等著



01181564



人民出版社

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

WENHUA YU DANGDAI GUOJI ZHENGZHI

张 骥 刘中民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京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18 千字 印数: 3500 册

ISBN 7-01-004133-4 定价: 27.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学术梳理及 相关讨论 (15)

- 一、文化概念的学术梳理及其与国际政治
相关性的讨论 (17)
- 二、文明：概念阐释及其与文化的关系 (30)

第二章 文化与国家安全 (39)

- 一、对传统国家安全观的若干理论分析 (40)
- 二、文化安全的提出及概念界定 (52)
- 三、文化安全与文化利益 (65)
- 四、文化安全在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77)
- 五、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及战略选择 (104)

第三章 文化与国家外交 (121)

- 一、民族文化与国家外交 (126)
- 二、传统文化与国家外交 (137)
- 三、政治文化与国家外交 (154)
- 四、意识形态与国家外交 (165)

五、文化与国家外交的手段 (180)

第四章 文化与国际冲突 (193)

- 一、国际冲突：一般的理论诠释 (194)
- 二、对国际冲突中文化作用的客观评估 (198)
- 三、文化影响国际冲突的原因分析 (206)
- 四、个案研究一：从文化层面看阿以冲突 (210)
- 五、个案研究二：从文化层面看伊斯兰世界
与西方的冲突 (218)
- 六、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质疑 (227)

第五章 文化与国际合作 (250)

- 一、国际合作：一般的理论分析 (250)
- 二、对文化在国际合作中作用的客观评估 (253)
- 三、文化影响国际合作的原因分析 (257)
- 四、个案研究一：伊斯兰文化与当代伊斯兰
世界的国际合作 (260)
- 五、个案研究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文化因素 (268)
- 六、个案研究三：文化与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 (280)

第六章 国际政治中的文化霸权与文化抗争 (300)

- 一、西方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主义 (304)
- 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意识与文化抗争 (315)
- 三、个案研究一：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扩张 (327)
- 四、个案研究二：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文化抗争 (343)

第七章 文化与全球化 (360)

- 一、全球化研究述评及其内涵 (361)
- 二、文化全球化：全球化研究不可回避的领域 (368)
- 三、从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 (375)
- 四、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世界化 (382)
- 五、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多元化 (388)
- 六、文化世界化与多元化的辩证关系 (393)

第八章 中国文化与中国外交 (396)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396)
- 二、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 (409)
- 三、文化传统与中国外交 (421)
- 四、对构建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若干思考 (435)

参考文献 (444)

后 记 (470)

绪 论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与事件,引发了人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从新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探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兴趣。于是文化问题引起国内外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把文化因素整合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产生了相当一批有关文化问题的论文和著作。

国外研究学者及观点主要有: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1989 年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题为《历史的终结》一文。文章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具有根本的性质。他认为,这些变化无可争辩地表明了西方和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而这正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1993 年他在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题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著作。1995 年他又出版了《信任》一书,提出制度在“历史终结”时呈现趋同的趋势。在制度发生趋同的今天,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由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信任和合作。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塞缪尔·亨廷顿 1993 年在《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 年他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著作。亨廷顿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进入“后冷战”的新阶段。在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冲突已不如过去那样重要，不同的国家发展了新的对抗和协调方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可以满足这一需要。亨廷顿认为，由于文化因素在全球秩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的冲突”的历史时期。在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他还预言，在当今世界的七八种文明中，距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有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的利益、价值和势力挑战。

美国外交政策理论家，曾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独霸世界吗？》一书和《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等论文中明确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他提出，应特别注意“硬权力”（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力）与“软权力”（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之间的区别。每年有 50 万外国学生希望到美国留学，欧洲人和亚洲人想看美国电影和电视，美国的自由对世界许多地区具有吸引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价值观是软权力的重要源泉。硬权力和软权力

皆至关重要。但在信息时代，软权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影响力。在奈看来，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主权斗争的新领域，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等“软权力”问题恰好是今天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国际关系中的新举措，并成为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战略。他还认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作为一位文化理论家，除了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研究外，还着力研究了第三世界文化。他从一种“共时性”的基点出发，一方面看到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看到当今世界图景中不同文化系统的冲突和对抗性。他指出，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做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第三世界文化面对后现代、后殖民性文化，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和处境中。他提出行之有效的文化策略是：第三世界国家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来对抗这种文化侵略，但绝不是指那仇视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将自己国家状况国际化的开阔胸襟和气

度。^①

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东京大学教授平野健一郎着重阐述了国际文化理论。他指出，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除了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外，还有文化关系，而且，文化关系并非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其生活方式。正是文化规定了人们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形态，因此，忽视文化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不完整的。他提出，所谓国际文化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二、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侧面；三、国际性的文化关系；四、国际文化。国际文化理论就是研究上述文化现象与文化关系的学问，它必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

美国《华盛顿季刊》主编迈克尔·麦哲在该刊 1996 年春季号上发表的《文化与国际关系》的文章中，总结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文化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归纳了迄今在文化与国际关系问题上的 5 个模式：一，“文化是生活的技能”，即认为文化是决定国家、民族和个人经济命运的关键因素。二，“文化是认识的过滤器”，即认为文化上的认识和信仰体系强有力地影响国家领导人看待政策问题，并且经常决定他们对待问题的选择方案。三，“文化是社会经济的构架”，即认为文化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结构方面起着设计者的作用。四，“文明冲突论”，即认为文化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五，“文化影响力日益衰落”，即认为随着全球化、信

^①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第 114—115 页。

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文化相互交融,不同文化的人们思想、观念、行为逐步一体化,各种不同的文化正越来越被共同文化所取代。

近年来,关于文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也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英国开放大学教授戴维·赫尔德等人撰写的《全球大变革》中,就专门讨论了文化全球化问题。该书认为,“尽管 3000 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是 20 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交流在全球范围覆盖的区域以及文化交流量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20 世纪晚期文化互动和文化交流在地理规模、直接性和速度等方面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转变——不仅出现了历史独特性的技术,而且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文化生产和互动的制度化。”该书还分析了当代文化全球化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①

日本独协大学教授星野昭吉在其《全球政治学》一书中也着重分析了文化与全球政治的关系。他提出,全球文化的性质与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限制着行为体的行为,以及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在全球文化的影响下,全球政治在本质上是复杂多变的。一般而言,从不同文化、政治背景的内涵与外延出发,每一个行为体都会提出不同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秩序、主权、安全、经济与文化的性质、结构、变化与涵义依赖于文化的全球

① 赫尔德:《全球大变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456 页。

化。^①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对国际政治文化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并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和著作。季羨林先生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文中，对世界文化发展规律作出了经典性的概括，提出从冲突到融合是文化交流的普遍规律。

李慎之先生在《辨同异，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的论文中，提出“不要仅仅看到今天的世界上还充满了对抗与争夺、征战与杀戮，事实上，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在开始了，在全球化时代，人员、物质、能量、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这样的交流必然要带来各个民族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近几年，费孝通教授多次提出“文化自觉”问题。他说：“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他提出，各种不同文化的人，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在这个经济和文化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跨文化交流”。^②

① 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93页。

② 《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1年第1期。

王沪宁在《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一文中着重探讨了文化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地位问题。他分析道：“文化因素是国际关系中传统的变量，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它的重要性不同。一般的逻辑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文化因素的作用就小，反之就大。冷战结束，恰恰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造成文化因素地位上升的契机。不是说过去文化因素不存在，或者不明显，而是说政治和军事这样的“硬权力”压住了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文化是“软权力”。一旦这种政治和军事的高压减弱，文化冲突和矛盾就会显露出来，甚至会以一种放大的方式显示出来。这也是国际关系的客观力量对霸权政治的一种反弹。所以在后冷战时代，文化的因素越来越重要了。”^①他还分析了后冷战时期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两个新动向：文化扩张主义（文化霸权与文化扩张）和文化保护主义（文化主权）。

冯绍雷在《论文化与外交的关系》一文中，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若干特征入手，探讨了文化对国际关系发展的作用。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国际社会经历了从政治自由到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文化的自我认同的转移发展过程，终于使文化不仅在内政，也在外交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他提出，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可以从传统文化对其载体外部行为的影响，从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化模式的选择和大众政治文化

^① 《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

三个层面上加以观察。^①

资中筠的《杂说东西方国家关系中的文化因素》一文从多个角度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是更为实际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较为抽象的文化。但是，文化层面的问题仍有重要意义，原因至少有二：首先，实际国家利益与文化因素之间很难划一条明确的界限，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定往往与文化背景分不开。第二，在西方与东方的国家关系中，西方文化的扩张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指出，国际间有些问题和冲突被认为是文化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一般说来，文化差异本身不足以导致民族间的冲突，关键在于能否恰当地处理好由于这一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各民族文化既按照自己的特色延续发展又在相互交融中相互丰富，从而共同繁荣的历史。

王缉思先生在评述“文明冲突”论战时，就文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当然，亨廷顿不是最早把文化或文明因素引入当代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在客观上，许多人都研究了民族、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的国际冲突，并研究了信仰系统相近的集团因争夺“正宗的传统继承人”而发生的冲突，政治文化的概念也早已进入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但是，由于二次大战后国际矛盾的主线是美苏冷战，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是防止核大战，有关精神文化因素所起作用的研究，在国际政治学中相当薄弱，在冷战后的海湾战争、波黑冲突、国际人权问题等事件和争论领域里、文化、宗教

^① 《欧洲》，1994年第2期。

等方面的差异比起冷战时期更为突出,亨廷顿及时抓住这点大做文章,挑起论战,启发思考,客观上应能促进学科发展,深化人们的对国际政治的理解。他指出,把文明看做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有学术意义的。但是,把文明和文化问题引入国际政治研究也要防止牵强附会。防止因极端或偏狭而上西方人有意或无意设置的圈套^①。还有一些学者以个别国家为典型,对文化与国家外交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如王晓德教授的《美国文化与外交》,计秋枫等人的《英国文化与外交》。

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对第三世界国家传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中国学术界又兴起了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研究,出版了一批译著和论文,如王宁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张京媛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徐贲的《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罗刚、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等。

概言之,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文化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对文化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启发人们拓宽国际政治研究范围,探讨新的研究视角。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他们或者片面夸大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或者从西方的战略和国家利益出发,建构自己的理论,其观点明显偏颇,研究为政策辩解或诠释的色彩甚浓。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出版了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著作,但此类

^① 《国际文化思潮评论》,第55、62页。

研究还较分散，整体分析和系统研究的成果还较欠缺。本专著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以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新形势为背景，系统探讨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本专著认为，文化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对国际政治有着多方面影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明显提升，如在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国际合作、国家主权斗争、全球化进程、国家对外政策与对外战略的制定及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致力于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就需要认真研究文化对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以便从更深层次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

本专著在研究方法上，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基本方法，分析国际政治中的文化问题既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关系，基于充分的事实资料，又要用变化和联系的眼光看待国际政治中的文化问题，强调事物的相对性，不夸大或过分强调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其次，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研究中既有理论分析的框架，又有典型个案的具体剖析，两种分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加强研究的理论性和说服力；再次，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由于文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研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内容，因此在研究中，注意吸收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心理分析等多方面研究成果，从多角度分析当代国际政治中文化的作用和影响问题。

本专著第一章，探讨了国际政治视野中文化与文明的范畴。什么是文化以及在哪个层次上运用这一概念，恐怕

是我们涉足这一研究领域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一直人言人殊，没有统一的说法。1952年两位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在合写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统计，从1871年到1951年这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1种之多。一般说来，文化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在广义上，文化包括了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具体说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及心理精神层面四个方面的内容。在狭义上，文化则专指人类精神活动过程及其相关精神成果。本专著主要是从狭义上理解，即把文化视为一种精神生产物，并进而分析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本专著第二章探讨文化与国家安全问题。在传统观念中，国家安全主要指政治军事安全，从客观上看，是指不存在威胁国家生存、领土边界的外部力量，从主观上看，是指不存在对于威胁国家生存和领土边界的外部力量的担忧。传统安全观的产生、存在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国际社会始终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宛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对国际关系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不可能是什么“温良恭俭让”的国际道义，而只能是不加掩饰的权力争夺。只有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强弱，才是决定国家在世界权力体系中位次和分量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只有不断增加本国军事实力，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冷战结束后，随着和平与发展主题的深入人心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大量涌现，“综合安全”的新安全观正逐步形成，并开始被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国际政治学者所接受。而文化安全或舆论安全是“综合安